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六十五期 2007年3月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No. 65, March 2007

戰後台灣經濟成長原因之回顧 ：論殖民統治之影響與其他*

瞿宛文

Inquiries into the Causes of Taiwan's Postwar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Wan-wen Chu

關鍵詞：台灣、經濟成長原因、日本殖民統治、國民政府、產業政策、冷戰

Keywords: Taiwan, causes of economic growth, Japanese colonialism,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dustrial policy, cold war

* 本研究得到中研院及國科會研究計畫(NSC-92-2415-H-001-007)的支持，作者也感謝兩位匿名評審的意見，以及南韓相關學者的協助，包括曹喜松、朴恩弘、張夏準、趙錫坤、李炳天、崔章集、李榮薰、朴泰均、洪起澤教授等。

收稿日期：2005年10月21日；通過日期：2006年9月4日

Received: October 21, 2005; in revised form: September 4, 2006

通訊地址：台北市11529南港區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

服務單位：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聯絡方式：wwchu@gate.sinica.edu.tw

摘要

東亞諸國戰後經濟發展的成績遠優於其他後進國家，但要如何解釋這表現上的差異，則是經濟發展領域中有高度爭議性的重要課題。本文以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為題，檢討關於台灣戰後經濟發展成因的各種不同解釋，期望有助釐清此重要議題。本文從「日本殖民統治是否帶來台灣戰後工業化」這問題來切入探討，並援引了南韓方面在這問題上的論爭與討論。學者幾都同意在日據時期，殖民政府在台灣引進了殖民現代化，幫助奠定日後工業化的基礎，因此爭議之處應在於殖民統治影響，是否帶來了可以自行持續發展的資本主義發展。雖然持自由市場論的主流經濟學者認為必然如此，但這是需要被證明檢驗的。

就本文所提問題，其他相關主要解釋因素為：冷戰架構與美國角色，國民政府在大陸時期的傳承，國民政府在台灣時期的作為。在經濟發展理論層次，自由市場論與結構學派，在公共政策所能扮演的角色上有截然不同的看法，這基本理論取向也影響了各種歷史性的解釋。我們未來必須進一步探討台灣戰後初期發展的實際情況，察看這些相關因素如何發生作用並影響到戰後台灣的經濟發展，才能真正回答上述的提問。

Abstract

How to account for East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een an important and controversial topic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This paper uses Taiwan's postwar development as an example, and examines the various explanations of Taiwan's superior postwar growth record, hoping to shed some light on this complex problem.

This paper first explores the controversy regarding to what extent, if any, the Japanese colonial legacy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postwar industrialization i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The debate on the Korean case is discussed. Regarding the case of Taiwan, most scholars would agree that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introduced colonial modernity and helped to lay the foundation of subsequent industrialization. The contention hence lies in whether the colonial legacy had "automatically" brought forth sustaine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ostwar period. For those economists adhering to the free market doctrines this would be self-evident, but for others the claim remains unproven and needs to be carefully scrutinized.

Other explanatory factors include: the postwar cold war framework and the US role, the Chinese Republican legacy on the Mainland, and the actual policy actions undertaken by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Different theories assign different weights to each of these factors. We will need further studies to examine the actual development process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in Taiwan to verify the validity of the relevant theories.

一、前 言

在國際的經濟學界中，研究經濟發展的學者都會同意，東亞諸國戰後經濟發展的成績遠優於其他後進國家，而要如何解釋這表現上的差異，則是經濟發展理論重要的課題。這問題在國際學界中持續的被討論，也一直充滿爭議，並且爭論的議題不斷變化，也在反應國際經濟學界整體思潮的變化。除了早先關於市場與國家角色孰輕孰重的爭論之外，近年來爭議的焦點也部分轉移到制度因素上，包括產權之必要性及殖民統治遺產的影響等。本文的目的是以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為題，檢討把梳關於台灣戰後經濟發展之成因的各種不同的解釋，期望能有助於釐清這重要的議題，能幫助我們瞭解我們的過去，並得出適當的歷史教訓。

從一九七十年代後期開始，自由市場論（或稱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逐漸取代凱恩斯主義，而成爲現今經濟學的主流。在經濟發展領域中，自由市場論者率先引用東亞經驗，將東亞經濟的成長歸功於對外開放政策，並解釋爲對於自由市場理論的肯定。其後結構學派（也稱修正學派）學者則予以反駁而加入論戰，這爭議到後來則幾乎成爲公共政策抑或自由市場孰優孰劣state vs. market的問題¹。近年來，新自由主義則因其標竿處方——華盛頓共識，在拉丁美洲及其他後進國家中實施結果不佳，而受到諸多的批評²。有些論者因而轉向探討「制度」的重要性，並特別強調建立私有財產權制度與「治理結構」（governance structure）對經濟發展的因果關係³。

這新一波圍繞著制度的討論中，因後進國家多曾經淪爲殖民地，

¹ 參見瞿宛文（2003），尤其第一、七及八章。

² 參見 Stiglitz（2002）對此之批評。華盛頓共識內容主要包括：自由化、私有化及財政緊縮。近二十多年來，當世界銀行與 IMF 對後進國家提出經濟改革（reform）要求時，即是以此共識爲既定方針。

³ 參見 Rodrik（2004）等。

因此不可避免的也觸及了殖民統治影響的問題。新自由主義者的推論方向多為：成長表現較好的後進國是因為原就有較好的制度，而較好的制度（多半意指私有財產權制度）很可能來自於較好的殖民統治⁴。當然，這說法很有爭議性，引發不少學者的批評。

在有些較成功的後進國如南韓等國家之中，很多當地學者針對殖民統治影響為何，是否有助於戰後經濟發展，而展開激烈的爭辯，這些相關的精彩討論，其中只有極少數得以呈現於英文文獻之中，而得以為外人所知。

比較弔詭的現象是，台灣雖然戰後經濟成長成績優異，但本身無論是一般輿論或是經濟學界，對此爭議——即如何解釋台灣的經濟成長，以及殖民統治的影響等——並不太感到興趣，對國際學界的相關爭議甚少評介，同時，台灣經濟學界本身也很少有學者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在經濟發展的英文文獻中，近年來就台灣經濟成長這議題而言，幾乎一定被引用的經典之作，是韋德（1990）的《管理市場》一書⁵，但此書在台灣經濟學界卻並未得到應有的注意。這現象背後的原因可能多重而複雜，但其中原因之一應是因為台灣社會整體尚沒有正面面對過去，以反思的態度去檢討過去。

近來台灣風行「本土化」，台灣史也成為顯學，從事者眾。不過，或許因國際上經濟史學門地位之沒落，從事相關台灣戰後經濟史研究的歷史學者數目不多，而經濟學者則人數更少。因此台灣學界整體對於上述問題很少涉獵⁶，除了少數學者正面評價殖民統治之影響，或是批評國民政府的統治之外⁷，台灣學界似乎還沒有達到將此議題「問

⁴ 參見 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 (2001) 等。

⁵ Wade (韋德), Robert, 1990, *Governing the Marke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⁶ 可參見林玉茹、李毓中 (2004) 所做的文獻檢討。

⁷ 如吳聰敏 (1997, 2003a, b) 就是台灣經濟學界極少數直接面對此問題者，他很肯定日本統治並極力批評國民政府的治理。

題化」的地步。

本文最終的關懷是希望能夠釐清上述的爭議，理解台灣在戰後為何能夠快速成長的原因。不過作為往這方面努力的第一步，本文將先整理相關的文獻。關於自由市場學派與結構學派關於東亞成長的爭議，已有諸多的討論，筆者也已在多處論述過⁸，在此將略過這部分，而從近年來關於制度與殖民統治的爭議談起。第二節將先介紹南韓關於日本殖民統治影響的爭議，以及相關的殖民統治影響的討論。第三節將討論關於啓始條件（Initial conditions）對經濟發展的作用的文獻。第四節將以Bruce Cumings的論述為主，討論強調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因素影響的理論。第五節則討論一些中國近代史領域中關於國民政府、以及其在台灣戰後經濟發展中的角色的討論。第六節則檢討一些目前既有的對於台灣戰後快速成長原因的不同說法。第七節中探討文化及主觀性因素的可能作用。最後再做一綜合討論。

二、南韓關於日本殖民統治影響的討論

南韓這近百年來的歷史發展和台灣有諸多相似之處。不過，與台灣不同的是，南韓學界對於自身經濟成長之原因，以及日本殖民統治對戰後經濟成長之影響，多年來已有很多很深入的探討與爭論，這方面的成果是其他地方尤其台灣學界無法望其項背的。因為南韓的討論對台灣有很高的參考價值，因此在此將對他們在這方面的討論作一介紹。在文本部分將主要依據英文文獻，然後輔以筆者在南韓對相關學者進行訪談的所得。

針對日本殖民統治的影響，南韓學界大致分為兩個陣營。一向來比較多的學者認為日本殖民統治的作用不單有限並多為負面，戰後成長是由 1961 年朴正熙建立的發展導向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所推動的。近年來則有些學者挑戰上述看法，而認為殖民統治帶來了現

⁸ 如附註 1。

代經濟發展，戰後成長只是戰前發展的延續。這些文獻多是以韓文寫作。Kohli (1994) 參考了近年採正面看法的韓國學者研究的新發展，首先在英文文獻中為文提出正面看待日本殖民統治的看法。Haggard, Kang and Moon (1997) (簡稱 HKM) 則針對 Kohli (1994) 提出反駁。這次的交鋒引起了南韓內外很大的注意。

Kohli (1994) 不單肯定殖民統治的正面作用，並認為戰後成長是戰前發展的一種延續，故稱為「延續說」(continuity thesis)。他主要提出三個重要機制及其延續性：日本殖民統治者 1) 將原先李朝傳統腐敗的統治，轉變成為一現代化的國家，2) 建立了互動良好、有助成長的政商關係，3) 徹底改變了社會關係，創造了一個可以維持現代高度成長的政治經濟架構。

HKM (1997) 則對此三個機制一一提出反證。

實績爭議。首先，在實證上，HKM 對於殖民統治下經濟成長實績的理想性與延續性提出質疑。他們同意戰前確實有工業化產生（工業佔 GDP 的比例從 1910 年的 4.8% 上升到 1940 年的三成）。但懷疑農業部門生產力是否真有進步，更不認為農村所得有所增進，反而因需出口稻米到日本而導致消費下降甚至飢荒。HKM 認為戰後的農業發展則完全不同，農業部門的產量、生產力及所得都大有增進。而這都歸因於土地改革與政治上的改變，及日本殖民統治的結束。

再則，他們也質疑戰前工業發展是否有長期正面影響。他們認為戰前工業主要在北方，且絕大部分為日資。企業主要管理人員都是日本人且於戰後撤離，同時工業設施在戰時毀損過半，以致於至 1948 年工業產量只及 1940 年之二成。簡言之，戰前工業發展績效缺乏延續性，因此長期影響不大。

打造現代國家。HKM 不同意 Kohli (1994) 認為日本殖民者幫戰後南韓打造了現代國家的說法，而這點正是「延續說」的核心觀點。就國家的三個元素——社會聯盟、政治領導及政府官僚——而言，Kohli 著重官僚部分，HKM 則強調是政治領導者決定政策方向，而不

是官僚。同時，政治領導權從 1930-70 年共經歷了五個不同的領導：日本殖民、美軍佔領、李承晚、張勉與朴正熙。在每一階段，政治聯盟、政策與官僚組成都有所不同。譬如在殖民統治時，官僚體系中韓人只佔三分之一，並都在下層。後來美國佔領者則提拔親美保守勢力，來填補日本人撤離後所留下的官僚體系內中上層的空缺。只有當朴正熙於 1961 年奪得政權之後，改革了政體與官僚體系，南韓政治上才出現了具有一致性的政策決策體制。

政商關係。Kohli 和 Eckert (1991) 一樣，都認為日本殖民統治幫助了韓國本地企業的成長。HKM 則認為只有一小群企業在殖民體制中受惠而成長，除此之外，殖民政府其實有各種差別性政策，優惠日本資本而歧視當地資本，以致於阻礙了韓人資本的成長，韓人企業大部分並未受益，基本上日本殖民統治沒有扶植本地資本。譬如，在 1983 年排名前 50 的大財閥中，只有 6 家是戰前成立的。

社會結構。Kohli 認為日本殖民統治建立了國家與大地主結盟，並且這社會結盟有效的壓制了農民與勞工，而這是個追求成長的體制，並且延續到戰後。HKM 則強調結構的變動，雖同意戰後壓制仍存，但認為戰後的土地改革與普及性教育，對社會結構起了根本性的改變，並幫助奠定支撐長期成長的基礎。

這個爭議可以由不同角度切入。延續說之所以如此命名，也是因為日本在殖民時期確實以極強制的手段作了諸多變革，在很多方面帶來了「殖民現代化」(colonial modernization)，包括土地丈量，建立私有財產權制度及私企業法律體制，引入市場，建立現代金融機構與制度，投資基礎建設等。總之，日本殖民政府確實在韓國強制性的引入了現代化的法律與經濟制度，建立了以私企業為主體的市場經濟。

漢城大學經濟系的李榮薰教授領導的團隊，正在進行建立韓國二十世紀國民生產總值長期統計數列的工作。他認為在二十世紀之前，韓國傳統經濟是停滯的，沒有成長的趨勢。在二十世紀初和日本經濟開始連結之後即開始走上成長之路。在二戰前生產總值平均年成長率

約3~4%，工業佔GDP比例從一成升為四成。在二戰後經濟恢復之後至今，經濟成長的年平均成長率為7~8%，並更進一步工業化。他認為戰前戰後兩個時期的相似性是很顯著的：1) 市場經濟，2) 出口導向成長，3) 自日本及(戰後)美國輸入資本與技術⁹。

李榮薰的看法應相當代表南韓主流經濟學界的看法。基本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不涉入如 Kohli 及 HKM 等政治社會學者關於國家性質的爭議，他們認為只要私有產權建立後，市場經濟也會建立，此後經濟成長「自然」會隨之而來。因此對他們而言，就成長記錄來看，日本殖民統治無疑帶來了經濟成長，戰後成長只是其之延續。

一般而言，在南韓社會，右派強調日本殖民統治的正面影響，而左派則淡化其帶動經濟成長的影響，而強調其負面的作用，包括強迫勞動、民族壓迫、政治鎮壓、階級分化擴大及教育機會受限等。

這其中當然牽涉到有關經濟發展基本理論問題。就後進國家如何發展而言，如前述主要有兩派不同看法。新自由主義者認為私有產權加上自由市場就可以帶來成長。而結構學派則認為後進國家相對於先進國家在競爭力上處於劣勢，必須要有發展導向國家，集中力量用產業政策改變價格與誘因，才能推動產業發展。

如 HKM 等學者是承繼結構學派的理論，認為戰後整個情勢已經與戰前產生斷裂，包括二次大戰本身、日本殖民者之撤離、美國之佔領統治、韓戰等。因此戰後南韓經濟所面對的局面和戰前是很不同的，經濟成長會「延續」的假設是完全忽視這些重大事件，及其所帶來的結構性改變，是不合理的看法。這派學者認為戰後南韓經濟成長是從朴正熙 1961 年奪權開始，從那之後朴正熙就積極改革政體，建立了一個發展導向國家，積極推動工業化，並取得了相當的成績。

不過有很多學者既不願肯定日本殖民統治對經濟成長的作用，也

⁹ 引自對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經濟系李榮薰 (Rhee Younghoon) 教授的訪談記錄，2004/10/11。

不太願意承認朴正熙政府起了重大的作用。朴正熙的威權統治，一直是追求民主化的南韓知識界積極反抗的對象。或許這因素也影響南韓學者對這些發展的評價。

Cumings (1999) 等學者認為朴正熙心中的發展藍圖來自他在滿州國當兵時的經驗，他在那時觀察到日本關東軍推動大型工業計畫的情形。不過這論點也曾受到挑戰。雖有人認為朴正熙的經建計畫是受美國的影響，但朴泰均 (Park, 2004) 則認為並非如此，朴正熙的經建計畫從一開始就很國族主義，要推動重化工業。在美國顧問的反對下才暫時擱置下來。朴正熙政府從 1966 年起積極參與越戰，不單從中獲取巨大利益，並且取得政策上的自主空間。故從 1970 年代起，朴正熙得以大力推行他原先擱置的重化工業計畫，實現他的國族主義願景。

戰後南韓政府，在政策上與日本殖民政府的經濟政策不同之處，除了積極推動工業化以及扶植本地企業之外，還包括土地改革與普及教育。不過也有學者對土地改革的成效及影響持不同的看法，如趙錫坤就認為戰後的土地改革並沒有起到一般所認為的大幅提昇生產力的效用¹⁰。在二十世紀前，韓國地權制度更接近封建，地權與王權豪族政治力緊密連結。日本殖民政府於佔領之初，立即進行土地丈量，建立了現代的私有財產權制度，同時此後更利用水利建設與農推制度，來大力推廣商品化稻米的生產。趙錫坤認為這些是有長遠的影響，戰後的土地改革則在經濟成長上沒有那麼大的影響，因為土地分割的太細生產力難提升。因此他是對殖民統治影響採正面看法的延續派學者，他也對朴正熙統治深惡痛絕，不願意承認朴個人有任何貢獻。

高麗大學的崔章集教授則指出，雖然南韓民眾對日本殖民統治反感很深，但是這情況也充滿矛盾。譬如說，南韓戰後至今的政治統治

¹⁰ 引自對南韓 Sangji 大學經濟史學者趙錫坤 (Cho Suk Gon) 教授的訪談記錄，2004/10/8。

菁英，幾乎都曾受日本教育或受日本影響很深。南韓的改革過程中，民主左派與保守右派的對立是一直存在的，而對日本的態度也是兩派的分歧之一，即保守右派是親日親美派。直到 2004 年 4 月為止，南韓保守派一直控治著國會。此後衝突激化，而對日本殖民的態度也成為政治鬥爭的爭執焦點之一，因此也才會發生檢討政治人物其家族祖先，在殖民時期是否為殖民統治者的合作人的爭議。這也是社會一直沒有正面檢討殖民影響，以致在六十年之後還會成為政治鬥爭的焦點，而如此政治化的討論當然不是很好的方式¹¹。

以上討論清楚顯現南韓情況和台灣類似之處甚多，對台灣的參照價值很高。這些將在文後再做討論。下兩節將先討論兩個理論性的問題。即分別討論經濟發展中啓始條件與外在環境的可能影響。

三、啓始條件 (Initial conditions) 對經濟發展的作用

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問題是要瞭解後進國家發展的條件為何。而殖民統治的影響之所以成為注意的焦點，是因為殖民統治的遺產，對於在戰後取得政治獨立的後進國家而言，是一種它在戰後初期開始要發展國家經濟的歷史時刻所具有的啓始條件。因此在此節中，我們要來探討啓始條件的作用，即就一般而言，包括殖民統治的影響在內的各種啓始條件，到底對經濟發展有什麼樣的作用。

Chang (2005) 正是討論了此一議題。他清楚的將關於啓始條件的討論，放回到自由市場派與結構學派關於東亞為何成長的爭議脈絡之中。自由市場派經濟學者強調東亞的成長是肇因於其特別優越的歷史啓始條件，而不是如結構學派所強調的產業政策的作用。爭議最終還是關乎經濟發展的成因。

Chang (2005) 特別將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以下簡稱非洲）

¹¹ 引自對南韓高麗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崔章集 (Choi Jang-Jip) 教授的訪談記錄，2004/10/9。

和東亞作為比較對象，看一些被認為是東亞戰後所特有的歷史條件，是否真的是東亞特有的條件，因而可以用來解釋東亞之成長。他檢查了以下的條件：

人力資源：戰後初期東亞的識字率只是比非洲稍好，但是在 1950-60 年代有很大的進步，而這改變是非洲多數國家所沒有的。

自然資源：曾有人提出「資源詛咒說」，即豐富的自然資源反而會養成惰性而妨礙長期的發展。東亞的人均可耕地以及人均資源秉賦都相當低，但是不少非洲國家也很低，同時不少先進國家（尤其是美國）卻很高。

基礎建設：就硬體基礎建設而言（包括運輸及通訊建設等），東亞在這方面確實比多數非洲國家好，但是遠比不上拉丁美洲，同時有少數非洲國家也不差。就社會性基礎建設而言（主要以嬰兒死亡率及平均壽命為代表性指標），則東亞確實優於其他地方。

工業生產的經驗：若以 1948 年製造業的人均附加價值來衡量，則東亞高於多數（非全部）非洲國家，但遠低於多數拉丁美洲國家。

外國援助：東亞得到的人均外援額度高於其他亞洲國家及（除智利外）的拉丁美洲國家，但稍低於有些非洲國家。

Chang（2005）總結以上討論，認為在戰後初期，東亞只有在社會性的基礎建設上，清楚的優於其他地方，但在其他條件上幾乎都落後於拉丁美洲，條件雖優於很多非洲國家，但也非全部，同時差距常很小。因此，他認為東亞在戰後的啓始條件並不特別優越，無法解釋東亞特別優越的經濟成長記錄。他批評其他學派學者試圖將東亞解釋成爲一個特殊的例外，其實是在逃避尋求真正的原因。而他認為真正的解釋還是要往政策面因素去尋找。

四、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因素影響

有個重要的因素可能沒有直接列在上節Chang（2005）的清單之

中，即戰後國際冷戰的局勢以及美國的政策，但這顯然是個重要的因素。Bruce Cumings是位極受尊敬的韓國專家及政治學者，在他豐富的著作中，他就一再地強調這戰後冷戰架構以及美國霸權在東亞的作用與影響¹²。

Cumings (1999) 認為不同的殖民經驗有很清楚不同的影響。文中他比較了台灣、南韓與越南的殖民經驗。法國於 19 世界末入侵佔領越南，主要還是希望取得一從南邊進入廣大中國市場的機會。法國在越南主要鼓勵農礦產品的出口，所作的有限的基礎建設只是為了方便這些商品的出口。因此在硬體及教育上極少投資。他認為法國在越南的殖民統治清楚的沒有帶來發展或現代化。

相較之下，日本則很不同。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就是在帝國主義的威脅下，把西方帝國主義現代化當作自己的計畫，將其內化、實現它、更進一步強加於日本的鄰居。日本積極的在韓國與台灣實行它剛剛從西方學習到的現代化計畫，以便證明它也可以加入西方先進民族的行列。因此日本殖民統治積極的以強制手法在殖民地進行現代化。韓國從一開始就被直接整合到日本經濟行政管理體系之中，在 1919 年三一大規模反抗示威運動之後，日本更進一步開始扶植當地資本與產業，甚至將日本的產業政策模式也移植過來。以致於至今，南韓在各方面包括工業、國家政策、教育、軍警、國防、城市面貌等，都幾乎是日本的翻版。北韓雖積極忙於「反」日本殖民統治影響，卻仍是清楚的受這殖民經驗的制約。

在冷戰架構下，台灣與南韓得到了美國霸權給予的所有的好處，而同時北韓與越南則受到最大的懲罰。不過近年來，越南與北韓已經在慢慢走入美國霸權的勢力範圍。

¹² Cumings (1984) 是他這方面的經典論述。他最被稱述的是他於 1981 年出版的兩大冊關於韓戰起源的力作—*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在此我們將引用他較新近的著作。

威權官僚式工業化政權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 industrializing regime (**BAIR**)。他認為日本學習並擴散了這韋伯式的殖民資本主義，而美國又在戰後的冷戰架構中極力維護這模式。因此東亞各國的模式有強烈的相似之處，他將這稱為威權官僚式工業化政權。這模式的特點是：

- 具強大官僚體系的國家。權力集中於中央政府。
- 普及初級教育，大量生產有紀律的勞工。較不重高等教育。
- 以各種可能方式，強力有效的監控民眾。
- 國族主義意識型態。
- 重商主義，強力行政干預推動工業化。以國家為中心推動經濟。

他認為這模式的相似性無可置疑，這相似性是由上述的歷史因素以及國際政治架構所決定。東亞就推動工業化而言，國家有很強的力量，但就國際政治而言，東亞處在美國霸權體系之中，只能算是半主權國家，而不能稱為是真正獨立的國家。

Cumings 的討論內容豐富，因其採取歷史性的論述角度，因此與其他著重純外因論的說法有根本上的不同。雖然說他也會承認如 Chang 等結構學派學者所強調的經濟政策的因素，也會同意這些經濟政策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他的討論層次似更往深處走了一步。他進一步探討這些政權為何會採取這些經濟政策，即這些政權為什麼會都是 BAIR。而對這問題，他提出的解釋是歷史因素及國際政治經濟架構，這些因素顯然是我們不能忽視的。

五、中國近代史領域中關於國民政府的討論

在東亞為何成長的相關研究中，雖說對於台韓的發展導向國家的作為與政策多所描述與討論，但是對於這兩個政權為何會如此作為，則著墨甚少。上述的如 Cumings 的研究則是就整個環境角度來著眼

的。文獻中對南韓的研究還比較多，對國民政府在戰敗後撤退到台灣後為何會成爲一個發展導向國家，則研究甚少，就只是一般性的認爲是因爲國民政府記取了它在大陸的失敗教訓而已。

近年來民國史的相關研究漸多，因國共對立緊張度漸減，兩岸雙方比較可以公開相關史料，進行相關研究。因此對於國民政府在撤離到台灣之前的歷史，以及它在戰前戰後的變革，有了較多的資訊，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國民政府到台灣來之後的作爲。

本文所關切的限於經濟發展相關的政策領域。近年來，大陸學者對於國民政府在大陸時期，在經濟發展方面的作爲開始有較多的整理，包括鄭友揆等（1991）及程麟蓀（2004）關於資源委員會的研究，還有相關人員的回憶錄也相繼出版，包括政協文史委員會（編）（1988）、資源委員會實際負責人錢昌照（1998）以及重要參與者何廉（1988）的回憶錄。而著名漢學家柯偉林（W.C. Kirby, 1990, 1992, 2000）就利用了這些材料，提出了新的看法，即認爲應將國民政府在台灣的經濟發展政策，看作是它在大陸時期的一種延續¹³。

國民政府於北伐之後，終於有機會開始進行建立現代化國家的努力，而經濟發展是其中重要部分。國民政府承繼了孫中山的《實業計畫》，立意要以計畫經濟方式快速工業化。1932年成立了國防設計委員會，1935年改組成資源委員會，以其較中立的實業救國的方向來招請科學工程專業人才。1936年訂出了「重工業五年建設計畫」，因爲得到德國的協助才有些具體的進展，主要以稀有礦產換取德國協助建立鋼鐵等重工業工廠，但因抗日戰爭隨即爆發而歸於烏有。戰時後方只有戰前全國工業的4%，資委會創建的企業因此成爲後方工業的主體。

戰前，因日本侵略危險在即，在強烈的危機感之下，中國的知識菁英幾乎不論黨派，都同意應該採用統治經濟或計畫經濟來快速的進行工業化。亦即共識是用公有制、計畫經濟來立即進行工業化。戰時

¹³ 以下的討論即引自上述這些著作。

緊急狀態下，更是理所當然由資委會全面掌控工業。1942年美國參戰之後，資委會開始為戰後計畫作準備，其中接收日產是主要工作，因此積極收集資訊，也在美方資助下派五百多名工程人員赴美受訓，其中包括一些日後擔負重任的人員。

戰後國民政府接收了二千多家日偽企業，除數百家小型企業讓與私營之外，絕大部分由資委會等公部門經營。至1947年8月為止，資委會共雇有三萬多職員、二十三萬多名工人，並掌控中國三分之二的工業資本。資委會原先在為戰後復建及工業化的計畫中，假設了政治的穩定、在日方人員協助下迅速復建工業、日本的賠償（拆遷日本工業設備到中國）、以及美國的援助等條件。但在內戰與冷戰的影響下，這些假設多半未得實現。資委會一向抗拒黨政軍勢力進入，保持相對的自主性，而隨著內戰的發展，資委會領導人對國民政府失望，導致最後資委會主動投向中共。

在接收過程中，台灣的工業也是主要由資委會（協調省政府）負責接收。而資委會當時針對台灣情況所採取的政策，也是全國性政策的一部份，亦即將當時日資企業收歸國有是當時全國性的既定政策。

柯偉林認為國民政府在大陸時期的經濟政策與經濟官僚體制，在大陸以及在台灣，都具有相當的延續性，即1949年以前的經濟計畫，在兩岸都有其延續性。在大陸上中共建國初期的國營企業，其實都是承繼資源委員會的基礎，包括人才、硬體與軟體。

在台灣延續性顯現在以下方面：資委會會指派相關工程及管理人才來進駐接管18個主要工廠，並在台設立辦事處，並不是因為1949年的政治撤退，而是源於1946年的經濟計畫。這些人才在未預期的情況下留在台灣，也成為日後經濟事務方面的領導人，人事的延續性必然意味著顯著的政策上的延續性。國家主導的進口替代工業化，以及國防相關的重工業發展都與之前有相似之處。確實，在戰後時期的前四十年，台灣公營企業的負責人多數出身資委會，並且曾有八位經濟部長源自資委會。

柯偉林認為這延續性其後在大陸與台灣最大的差異，在於蔣介石國民政府在某些條件下，容許非政治化的專業主義，容許這些經濟官僚主導經濟政策，這則是中共所不容許的。因此雖只有極少數資委會人才意外的到了台灣，絕大多數志願的留在大陸，但是留在大陸的人才幾乎都沒有行政權力，甚至日後受到迫害。而這極少數到了台灣的人，則因有機會發揮才能，而發揮了更大的影響。

他以資委會派到美國受訓的第一批 31 人為例來說明此點。這資委會第一批赴美受訓的 31 人有很強的共同使命感，組成「三一學社」，日後數十年中也盡可能保持了聯繫。31 人中有三人留在美國，21 人留在大陸，另 7 人到了台灣。留在大陸的 21 人中其最高位置如下：7 位總工程師，2 位高級工程師，7 位作研究，二位在 1950 年代病逝，二位在文革中死亡。在台灣 7 位，則包括做過經濟部部長及行政院長的孫運璿，其他有三位做到國營企業負責人¹⁴。其他知名的資源委員會的成員包括 1944 年被派赴美國而留下來日後創立王安電腦公司的王安，以及 1948 年被派到台灣造船公司的李國鼎。

Bian (2005) 研究了二戰時期國府的軍工業發展，他的看法也與柯偉林相同，認為後來中共的國營企業體系的起源是在 1937-1945 資委會時期，是相應於抗日戰爭危機而建立演化出來的制度。

柯偉林身為歷史學者，提出歷史大視野，要求我們將兩岸發展，看做是中國近百年來為了回應西方現代化的挑戰，而做出的各種努力。因此兩岸經濟計畫都與大陸的民國時期歷史有延續性的關係。他提出的歷史面向雖一向被忽視，但顯然極為重要。我們若要瞭解台灣戰後初期經濟發展的情況，就必須理解國民政府的傳承，包括它的人員以及思想上的承繼與改變。上述這些研究有助於我們理解國民政府

¹⁴ 這例子詳見 Kirby (1990: 139-140)。「三一學社」名稱是源於資委會戰時第一批出國受訓者共 31 人，且出國時間為民國 31 年，故學社特別成立於當年 5 月 31 日（程玉鳳、程玉鳳（編），1988: 125-128）。

的傳承，但是對於它在台灣之後的變革，則尚待更進一步的探討。

六、對於台灣戰後快速成長原因的不同說法

上述討論中，Chang (2005) 與 Cumings (1999) 的論述雖然不是針對台灣的情況，但也是涵蓋在其中。亦即 Chang (2005) 認為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條件是產業政策，殖民統治影響屬於歷史啓始條件，絕非關鍵因素。Cumings (1999) 則認為東亞的歷史條件與冷戰架構的因素極為關鍵，因此使得台灣與南韓的發展模式與日本極為相似，都是屬於他稱為 BAIR 的模式。柯偉林則是清楚的從歷史角度，指出民國時期的經濟官僚體系以及其政策傳承，同時影響兩岸。本節將進一步討論專門針對台灣戰後經濟發展成因曾提出過看法的幾位學者的論述。

結構學派學者當初在這方面的書寫，主要是爲了反駁自由市場派認為「東亞成長應歸因於其依賴自由放任」的說法。Amsden (安士敦) (1979) 與韋德 (1990) 都列舉各種例證，來說明台灣戰後經濟發展過程中，國家扮演了主導性角色，產業政策起了關鍵性作用。而 Chang (2005) 則是將政策的角色更進一步提昇，認為歷史啓始條件並非主要，政策才是關鍵。

不過，既然很多結構學派學者強調政策，是爲了反駁自由市場派否定政策作用的說法，如果將討論的層次往上推一層，來探究爲何有些國家會採取發展導向政策，而多數後進國家卻不會，則結構學派學者未必有一致的看法，未必都會同意 Chang (2005) 的論點。這部份也和發展政治及社會學領域中，關於發展導向國家產生條件的討論有關聯。

安士敦在她 2001 年新作中，就開始了往上一層次的探討。安士敦 (2001) 以二戰後工業化較有成績的後進國家爲對象，試圖歸納出這些國家爲何較能工業化的原因。除了指出他們不約而有的發展出相

互制約的機制 (reciprocal control mechanism) 之外，也強調他們在戰前皆有進行製造活動的經驗，這包括以下幾方面的經驗：1) 勞動力；2) 受雇的經理人；3) 生產知識；4) 計劃執行能力 (p.105)。在書中，她也援引南韓與台灣的案例，指出日本殖民統治確實帶來了工業製造的經驗 (Ch. 5)，並且也使得東亞在戰後以日本模式為師推動工業化 (Ch. 7)。

日本殖民政府在韓國推動工業化的程度遠超過其在台灣的作為，不過戰後從大陸移入的資本與人力資源部分彌補了這差異。安士敦 (2001:106)，Gold (1981) 和韋德 (1990) 都提及日本殖民統治的影響，認為國民政府之能在戰後初期成功啓動工業化，和其能繼承殖民統治遺產有關，尤其是日本殖民政府在社會經濟中之主導地位。提出這觀點的學者不在少數，不過安士敦 (2001) 則較系統性的、由跨國比較研究來探討這問題。

安士敦 (2001) 也歸納出兩類後進工業化國家，一類她稱之為整合型 (Integrationist)，即如拉丁美洲新興工業化的國家，它們與外界關係一直較高，並且工業化主要依賴外國企業，另一類是獨立型 (Independents)，即如東亞國家，它們在戰後與原殖民者關係中斷，戰後工業化主要依賴本國企業。安士敦雖在書中沒有直接說哪一類型發展成績比較優越，但其實在她其他著作中，早一再指出獨立型成績是遠較優越的。這其中也涉及一重要而弔詭的問題，即日本殖民統治的影響，是否必須在日本殖民者戰敗撤離之後，其遺產才能在當地發展導向國家的主導下成為工業化開展的基礎？如果經濟發展必須依賴本國企業，那這問題的答案就是肯定的。

英文文獻中另一重要作者 Gold (1981)，倒是在他博士論文中對我們在此所關心的問題作了正面的回答。他主要是針對當時當紅的 Evans (1979) 的依賴發展理論做出回應。Evans 的依賴發展理論基於拉丁美洲的經驗，他認為當地國家和私人資本與跨國公司形成三方聯盟，共同進行充滿問題的依賴式經濟發展。Gold (1981) 用台灣戰

後發展為例來檢驗這理論的適用性，他發現台灣雖也存在這三方聯盟，但運作完全不同，結果也截然相異，台灣竟能達到持續性的快速成長。Gold 雖然也認為日本殖民統治幫助奠立現代化基礎，但他認為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國民黨/政府是這三方聯盟中的強勢主導者，能自主性的主導推動工業化，其位置與能力遠非拉丁美洲的弱政府所能望其項背。

劉進慶（1992/1975）與涂照彥（1991/1975）可稱的上是戰後本地人所撰寫的，關於台灣早期經濟發展兩本最重要的著作。劉進慶（1992/1975）以政治經濟學的方法，對台灣戰後初期的經濟發展，作了詳盡的歷史性分析，這本著作至今仍是這方面最典範最重要的一本書。書中詳述台灣戰後國家資本主義的形成，認為其具有前現代性格，因此同時意味著專制主義化與家產主義化。私有資本在國家的保護下成長，因而逐漸形成公業與私業結合的「官商資本」。雖然書中沒有正面的就台灣戰後經濟發展成因提出概括性的答案，不過，作者呈現的是一個國家主導的過程。在接收日本獨佔資本的基礎上，國民政府得以建立國家資本主義，然而與在大陸上作法不同的是，仍扶植私有資本的成長，以致形成公私結合的官商資本。因此可說此書的論述與結構學派著重政策的觀點相符合，但更著重歷史因素。

涂照彥（1991/1975）雖然是討論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不過他也對日本殖民統治影響做出了評估。他認為舊時台灣所遺留的傳統社經結構，都被日本積極利用，但這些並沒給本地資本帶來好處（除少數特權買辦外），反而被控制遭壓制而衰落。殖民地化並沒有帶來全面資本主義化，台灣糖業方面的資本主義化發展，並不是如矢內原忠雄（1985）所說的「資本型態的歷史性發展」，而應將其視為與日本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相對應的特殊發展，其「本身不具有獨自一套的歷史性發展型態」。他認為必須區分 1）殖民主義特色；2）台灣傳統社經的歷史性特徵。後進的最後帝國性格，使得日本在統治台灣時，國家權力強力主導，使得台灣具有濃厚日本中央集權官僚統治的經濟性

格。台灣殖民地經濟的特徵，被戰後體制繼承下來。在日據時代地主階級的弱化，使得戰後農地改革得以順利進行。而本地資本的弱化，則使其難以繼承日本企業，使得國府較易以國營企業全面承繼主要的日資企業。因此涂照彥顯然認為日本殖民統治，雖為台灣帶來了某種形式的資本主義發展，但是並沒有帶來可以自行持續發展的資本主義發展。這是一個比較特殊且很重要的說法，文後將再作討論。

Chang and Myers (1963) 主要討論 1895-1906 年日據早期的發展，認為兒玉與後藤新平是很有企業家精神的殖民統治官僚¹⁵，不單進行了必要的改革，並且努力推動產業發展，成功吸引了日本私人資本的投資，因此很快的達到了財政上的獨立，也為以後台灣成為供應日本米與糖的生產基地奠定基礎。雖說作者並未直接討論本文關切的問題，即日本殖民統治對戰後發展的影響，不過，此篇重點為讚揚兒玉與後藤為具企業家精神的殖民官僚，觀點相當能代表一些認為日本殖民統治開啓了台灣資本主義發展的學者的看法。兩位作者（張漢裕與馬若孟）其他的著作也大致符合這樣的立場。

其他關於日據時期台灣經濟史的討論，可參考葉淑貞 (1994b)¹⁶。她文中將相關的觀點分為（1）中國邊陲論，（2）階級剝削論，（3）現代化論。其實第一類和後兩類並非互斥。採馬克思理論觀點者如矢內原忠雄等，雖然強調帝國主義者對當地人民的剝削，資本及地主對基層人民的剝削，但實際上多同意殖民統治帶來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看法，因此對於我們關切的問題——即殖民統治是否帶來戰後工業化，其答案和第三類現代化學派的相類似¹⁷。至於第二與第三類學派

¹⁵ 其論文篇名就稱此為“A Case of Bureaucratic Entrepreneurship”。

¹⁶ 葉淑貞 (1994a) 也檢討了日據時期台灣經濟史的研究，不過是特別檢討利用了數量方法的文獻。

¹⁷ 現代馬克思理論陣營，對此問題看法有歧異。有一派採用馬克思「英國帝國主義到印度會不自覺的複製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看法。另一派則是依賴理論，其強調

學者關於殖民統治是否使得基層人民生活得以改善的爭議，因為不是本文關切的重點，且葉文也已介紹，故不在此多作討論。就本文關注點而言，如上述涂照彥（1991/1975）所持之看法——台灣殖民經濟本身不具有獨自一套的歷史性發展型態，是一和上述論點有所不同的觀點，值得進一步比較探討。

如葉淑貞（1994b）所言，近年來台灣史的研究雖非常蓬勃，但經濟史方面的研究多由歷史學者為之，經濟學者則甚少涉入此項工作。吳聰敏是除葉淑貞之外另一位著力於此的本地經濟學者。吳聰敏（2003b）主要是要就日本殖民統治對台灣經濟成長的貢獻做出評價。除了應用國民所得統計之外，他進一步作了反事實的假設式推斷比較，提問說在日據那段時期，若台灣不是由日本統治，「若台灣繼續接受清國與國民政府統治」，則其可能的經濟成長成績為何？推論比較之下當然日本殖民統治下實際成長數值遠較後者可能數值為高，因此他認為殖民統治顯著提升了台灣人的福利。既然在日據台灣的同時期，中國大陸經歷了無數次規模龐大的革命與動亂，此比較結果不用推論研究應就可輕易得出。其實應沒有人會否認日據時期台灣經濟確實有相當的成長，爭議是在於其長短期的影響。不過吳文研究架構確實顯現出一種有普遍性的前殖民地人民「選擇」殖民者的視野角度¹⁸。

吳聰敏（2003a）是一篇簡短的「台灣經濟發展史」，其一開始就言明四百年來台灣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時期是日本統治台灣的 51 年，日本將台灣從一落後的傳統經濟變為現代化經濟。文章最後一小節終於討論「戰後成長奇蹟」，作者雖承認台灣戰後人均所得成長率很高

帝國主義者對落後經濟的掠奪，認為帝國主義在落後國家不單剝削當地人民，並阻礙當地經濟發展。此爭議可參見瞿宛文（2003）。

¹⁸ 譬如，巴西也一直流傳一種看法，即若當初巴西是由英國來殖民，而不是葡萄牙，那今天也會如美國般富有，並會講當紅的英文，而不是講沒人用的葡萄牙文。*The Economist, Why Isn't Brazil Rich Like America?*, 2003/2/20.

(他沒提及其高於日據時期)，但認為成因至今並未有定論，因而未做進一步討論。倒數第二節討論「美援」，作者則暗示美國促使國府尊重私人企業發展，或幫助了台灣的成長。

這關於美援角色的看法也具有其代表性，亦即不少人認為國府早期的經濟政策是因為聽從美國顧問意見，才得以有較好的政策品質。不過這方面本地學者所做的具體研究甚少。早期 Jacoby (1966) 主要是受美國開發總署之委託而作的研究。開發總署在六十年代初期，被一些參議員批評說沒有盡力促進當地國私人資本的發展，故請 Jacoby 來為其在台灣的作為辯護，因此其力證美國援助成效的立場可以理解。這其中原委也已由 Cullather (1996) 闡明，不過 Cullather (1996) 文章主要是指出其實當時美國顧問事實上支持台灣政府各種干預性的產業政策，而不是遵循自由放任政策。

不過，認為美援（在物質上及政策方向上）扮演關鍵性角色這個說法其實相當弔詭。首先，就先進國物質援助而言，這種援助對後進國當地發展的影響，在各地成效差異極大，以致於至今沒有學者會說援助必然可以帶動當地發展，甚至有學者認為援助常會帶來負面影響。譬如說，美國對國民政府在戰後大陸時期之大量援助，顯然並無很好的成效。再則，就先進國政策顧問的角色而言，如果針對台灣此案例，而認為成長成效可歸因於美國顧問意見，那也就意味著同意「政策是導致成長的主要因素」這結構學派的看法。因為美國顧問的意見，若能發揮作用，必然需要透過當地政府的政策。在台灣很多學者不同意國民政府在經濟發展上有任何功績，但若因此歸因於美國顧問的影響，則反而會不自覺的成為結構學派的同路人，想來應非其原意。

總之，吳聰敏、葉淑貞等學者認為日本殖民統治為台灣帶來了現代化，對於國民政府的統治比較強調 1945 至 1949 年的「經濟災難」，以及接收日產轉為公營的「政策錯誤」，也質疑土改成效認為土地改革並未帶來效率改善，並推想美援是關鍵因素，但是對於如何解釋「戰後成長奇蹟」，則尚無答案。

七、文化與發展意志

本文所探討的文獻中，或是著重環境與秉賦限制性的因素，或是強調政治社會與經濟結構的決定性影響，但甚少談論發展策略如何形成。文獻中雖然都假設有不同的發展策略存在，但幾乎都沒有談到策略的形成過程，以及策略形成時，決策者所持有的對於政策行動相關的預測、假設以及意圖。任何關於政策形成的討論，也多半是著眼於各種利益團體「必然」會如何影響政策的分析。但甚少討論決策者的目的與意圖為何。

譬如，這二三十年來，將拉丁美洲國家與東亞國家作比較研究的文獻汗牛充棟，但多半強調階級結構差異所造成的影響。亦即拉丁美洲國家大地主與其他階層利益衝突，造成政策上的搖擺反覆與經濟的落後，而東亞國家則能保持相對於社會的高度自主性，易於推動有利於整體經濟成長的政策等等。

這些分析基本上沿著結構決定論（determinism）的理路，而沒有處理主觀或文化因素的作用。當然這些因素處理上的困難是顯而易見的，但並不表示其不重要。

以儒家文化因素來解釋東亞經濟成長的文獻，一般而言並不成功，因為其將文化本質化、非歷史化、抽離於當時的社會經濟環境來談，所獲必然有限。

不過有少數學者曾試著正面處理過這難題，如 Dore（1990）與 Eckert（2000）。Dore（1990）試圖歸納拉丁美洲與東亞國家發展模式的差異，他認為拉美國家並非從一開始就排斥出口導向策略，其與東亞不同之處在於政府比較不會去取消或限制保護的期限，因此工業難以進步因而缺乏競爭力不易出口。他認為這差異不能只是從國家的能力來解釋，而牽涉到發展的意志（the will to develop）。在爲了處理問題而須從各種政策方案中作選擇時，相較於拉美國家，東亞國家的決策者比較會考慮到國家經濟長期發展的前景、國家的獨立性、甚或

社會的和諧。這就是發展意志上差異的顯現。

為何會有發展意志上的差異？Dore（1990）追隨 Gerschenkron（1962）關於落後者的優勢的說法，而提出了「落後感」（the sense of backwardness）的概念，亦即落後國家的菁英對國家在國際上地位落後的共同感受程度。顯然，相較於拉美國家，東亞菁英對於國家地位落後有較強烈的共同感受，對於國家要迎頭趕上有高度共識。Dore（1990）對於這落後感的差異提出了很有意思的解釋。他認為落後感與菁英個人經驗有關，而拉美的菁英文化源自西歐，拉美菁英作為個人在文化上未必會有落後感，甚至會瞧不起北方先進國知識份子的文化素養。

但東亞菁英的處境顯然不同，Dore 引用了一個故事來作說明。在1975年底，當時的日本首相三木武夫去法國參加工業先進國 G6 第一次高峰會議，會議在富麗堂皇的路易十六的行宮蘭保葉城堡舉行。會中法國總統吉斯卡提到說高峰會的某些計畫有點像薛西弗斯（Sisyphus）的努力，其他與會者（包括英美德義的總理或總統）都熟悉這希臘神話中薛西弗斯必須不斷重複推大石頭上山的故事，只有日本首相不知道，而必須由旁人解釋說明。這使得三木武夫感覺自己是個不屬於這國際菁英團體的外人，因此決定下次高峰會之前要找本希臘神話的書研讀。Dore 是在日本雜誌上讀到了這相關的報導。這故事顯示東亞菁英因為東西方文化上的差異較大，身處在西方文明主導的國際場域之中，既然西方文明被認為是必備的知識，就容易會因為對西方文化的不熟悉而產生落後感，甚至羞愧感。

同時，在二次戰後初期，拉美經濟水準甚高，社會上層的文化也可與歐美抗衡，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輩出，不易感覺落後。再則，拉美社會種族與階層分化比較嚴重，較缺乏國家觀念（a sense of nationhood）。同時，拉美較缺乏為未來壓抑消費的文化（the capacity to defer gratification），上層階級維持著消費進口奢侈品的炫耀性消費文化。

Dore（1990）做為西方人，雖然他很有洞見理解到東亞這落後感

的存在及其高於拉美於其他地方，但顯然不易清楚體會到東亞菁英落後感的強度。其實，在中國與韓國，近百多年來承受西方帝國主義與日本殖民主義的摧殘，相對於其既有的傲人古老文明傳統，其菁英應不只是有現實上的落後感，更還帶有著歷史上傳承下來的「屈辱感」。正是這落後感與屈辱感，給予東亞菁英在國家發展上極大共識，並顯現在統治與知識菁英堅強的「發展意志」上。

若我們進一步探究，相較於其他曾淪為殖民地的落後國家，為何東亞菁英的屈辱感看來比較一致並且強烈？這或許和科舉制度以及儒家道統傳承下，文人官紳一體擔負起治國責任的傳統有關；或許和東亞文明曾經達到的高度有關。要探討東亞文明對東亞經濟成長的影響，從這些角度去探究或許會有比較有意義的結果。

南韓專家 Eckert (2000) 雖然在他以前的寫作中，較為強調日本殖民統治帶來資本主義之作用，但是在這篇較新近的作品中，則以“A Will to Greatness”為題來描述韓國百年來走向現代化道路的意志與決心，立論與上述 Dore (1990) 雷同。他同時指出，意志亦極強的北韓之發展失敗，是單單依靠意志力並無法達到經濟發展的好例子。不過他認為這堅強的發展意志，是發展經濟的必要條件，而意志力是深植在該國家的歷史之中，被殖民的屈辱經驗只是更為增加這意志力的強度。

為了解釋東亞國家的發展取向，有些政治學者曾強調冷戰下外在威脅及競爭的因素，即緊鄰的共產北韓及中共的威脅，促使國府與南韓努力發展。這也是延續前述的結構決定論的理路，但實際上，歷史一再證明且有太多案例顯示，外在的威脅並不必然會帶來內在的改革與自強。

前述柯偉林等學者，雖討論了國民政府在經濟官僚體系以及發展理念上，繼承了民國時代的遺產，但並未強調這「動力」或「發展意志」的面向，而或許這其實是更重要的決定性因素。我們若追隨上述 Dore 等提出的架構，就更能清楚的指認出「發展意志」對台灣戰後經

濟成長的關鍵性作用。亦即隨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的菁英官僚，不單承繼了中國百多年來爲了回應西方挑戰所累積的學習效果，更承繼了強烈的屈辱感與發展國家經濟的強烈企圖心，這些就顯現在國民政府超強的發展意志上。

到了二十一世紀之後，台灣政黨輪替換上了民進黨執政。在同樣的外在客觀環境（外在威脅？）之下，相對於先前國民黨呈現的超強發展意志，這不同的政黨在這方面顯然有所不同，其成因則尚待探討。

文化與發展意志等因素顯然有其重要性，但是因爲方法上處理困難，因此在應否及如何處理上爭議甚多，仍待進一步的研究。

八、小結

以上已對本文提出的問題——殖民統治是否帶來台灣戰後工業化，就相關的論述以及針對台灣情況的研究作了瞭解與討論。從檢討這些文獻中我們可以得出何種結論？

學者幾乎都同意在日據時期，日本殖民政府積極引進了「殖民現代化」，建立了土地私有產權以及諸多如銀行、新式學校等現代機構，也促成台灣農業轉型採用現代化生產方式，農業生產力得以持續增長，因此能輸出米糖到受保護的日本市場。對於這發展是否帶來當地人生活水準持續的改善，則比較有爭議。工業的部分則不同。日據時期主要的工業是製糖，並幾乎全是日資企業。戰時才建立了些軍需工業，也主要是日資。

南韓情況與台灣相類似，但日據時期韓國工業化的程度較台灣深很多。在南韓殖民統治影響的爭議爲何會被界定爲「延續或斷裂說」，也就是因爲大家都同意日據時代在日本強力引入下某種現代化確實產生，因此爭議在於這影響在戰後是否延續其影響。在台灣雖工業化程度較淺，但是日據時期經濟成長的成績無可置疑，問題在於其是否或如何影響戰後的發展，在於日本殖民統治是否帶來了「可以自行持

續發展的資本主義發展」，並導致了戰後極為快速的工業化？

現代化學派以及主流經濟學者，多半會對上述問題立即給予肯定的答覆。因為他們多認為資本主義發展是一種「自然的」狀態，一旦現代化就會持續發展，也不需要政府作何干預。若只是援引成功發展的案例如南韓與台灣，則它們戰後持續不斷的成長趨勢，好似可以支持這種說法。但問題是若以全球為範圍，將所有落後國家成長的紀錄納入考慮，則會發現東亞持續不斷的成長實在是個例外。二戰結束之後，非洲國家或許現代化過程原本就沒真正開始，因而此後也沒有成長趨勢。不過，多數拉丁美洲國家在那時則絕對早已經走上現代化道路，在戰後初期的所得水準更遠超過東亞，但是這些都無法確保它們在戰後能夠持續成長。

因此，以落後國家成長的紀錄來看，無論戰後啓始點是高是低，持續不斷的成長趨勢絕對是個例外，不能假設其為「自然」而不需解釋。同時，如 Hausmann and Rodrik (2003) 所言，要能夠維持經濟成長，必須不斷學習「發現」自身的利基何在，並據而不斷的修改產業政策。

引伸到本文的問題，相關意涵是日本殖民統治是否帶來了「可以自行持續發展的資本主義發展」並非自明的道理，是需要證明的。更何況台灣戰前主要變化在於農業部門，戰後極為快速的工業化與戰前發展的關連，原本就需要進一步的檢驗。這並非表示殖民統治影響不重要，但意味著這影響不會自行帶來戰後的成長，這影響的作用是會透過其對戰後當地情境影響而顯現。

我們必須依據上述所整理的爭議與線索，仔細檢驗台灣的情況。線索包括如關於南韓 Kohli 與 HKM 對於日本統治在社會聯盟、政治領導與官僚體系方面所留下的遺產的爭議，如安士敦認為日據時期製造經驗所留下的影響，如涂照彥所言「日本殖民統治並未帶來可以自行持續發展的資本主義發展」到底是何含意，如何偉林所言國民政府大陸時期的傳承，如 Cumings 所言東亞冷戰結構的決定性作用以及

BAIR 模型的普遍性之意義等。我們還是必須回到結構學派的架構，任何時候國家政策都會起關鍵性的作用，包括正面與負面。而殖民統治的影響，在於其遺產會以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形式顯示，在於它會如何影響發展導向國家的形構與能力。

同時，如 Dore 關於「發展意志」的討論給我們的啓示，我們也應該超越決定論式的推論，進而正面探索文化及主動性因素的作用，深入理解中國百多年來知識菁英所累積的迎頭趕上西方的強烈動力，是如何在戰後台灣竟然得以形塑成國家的超強「發展意志」，終於成功的幫助推動了台灣戰後快速的工業化。這些都有待我們進一步進行具體的分析研究解疑。

參考書目

- 矢內原忠雄（1985）《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周憲文譯，台北：帕米爾書店。
- 何廉（1988）《何廉回憶錄》，朱佑慈等譯自英文版，北京市，中國文史出版社。
- 吳聰敏（1997）1945-1949年國民政府對台灣的經濟政策，《經濟論文叢刊》，25（4）：521-54。
- 吳聰敏（2003a）台灣經濟發展史，台大經濟系。<http://ccms.ntu.edu.tw/~ntut019/ltes/ltes.html>。
- 吳聰敏（2003b）日本殖民統治與台灣經濟成長，台大經濟系。網址同上。
- 周婉窈（1997）《台灣歷史圖說：史前至一九四五年》，台北：聯經出版社。
- 林玉茹，李毓中（編著）（2004）《戰後臺灣的歷史學研究，1945-2000》，第七冊臺灣史，台北市，國科會。
- 林邦充（1969）台灣棉紡織工業發展之研究，《台灣銀行季刊》，20（2），76-125。

- 林滿紅（1996）有關日據時期台灣經濟史的四種誤解，《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23 期，1996/7. 147-157.
- 政協文史委員會（編）（1988）《回憶國民黨政府資源委員會》，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工商經濟組，北京市，中國文史出版社。
- 徐振國（1988）我國威權政體的發展及經濟制度的演變：其互動關係的初探，《政治學報》，12 月，16：21：47。
- （1990）大陸時代和來台初期的尹仲容，《歷史月刊》，24 期，49-54。
- 涂照彥（1991/1975）《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李明俊譯，人間台灣政治經濟叢刊(1)，台北：人間出版社（原日文版出版於 1975）。
- 許福明（1986）《中國國民黨的改造，1950-1952》，台北：正中書局。
- 康綠島（1993）《李國鼎口述歷史：話說台灣經驗》，台北縣：卓越文化出版。
- 張宗漢（1980）《光復前台灣之工業化》，臺灣研究叢刊，台北：聯經。
- 張怡敏（1999）戰後台灣民間資本積累之探討：以紅糖經營者為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35 期，9 月，119-62。
- 張漢裕（1974）《台灣農業及農家經濟論集》，臺灣研究叢刊#111，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許介麟（1996）《戰後臺灣史記》，台北：文英堂出版社。
- 郭逢耀，崔洲英、林明姿、鍾靜宜（1997）民國二十六年至三十九年台灣區國內生產毛額之推估，《經濟論文叢刊》，24(3): 207-76。
- 陳思宇（2002）《台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與經濟發展策略 1949-1953》，台北市，政治大學史學叢書（9）。
- 陳鳴鐘，陳興唐（編）（1989）《台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南京：南京出版社。
- 程玉鳳、程玉凰（編著）（1988）《資源委員會技術人員赴美實習史料：民國 31 年會派》，臺北縣：國史館。
- 程麟蓀（2004）中國計畫經濟的起源與資源委員會，《二十一世紀》，第 82 期，2004/4，88-100.

- 黃紹恆（1996）從對糖業之投資看日俄戰爭前後台灣人資本的動向，《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23 期，1996/7, 83-146.
- 葉淑貞（1994a）台灣「新經濟史」研究的新局面，《經濟論文叢刊》，22：2，127-167.
- 葉淑貞（1994b）論台灣經濟史研究的歷史解釋觀點，《經濟論文叢刊》，22：4，477-503.
- 葉淑貞（1996）台灣工業產出結構的演變：1912-1990，《經濟論文叢刊》，24（2）：227-274。
- 趙既昌（1985）《美援的運用》，中華民國經濟發展策略叢書，台北：聯經。
- 劉進慶（1992/1975）《台灣戰後經濟分析》，王宏仁、林繼文、李明俊譯，人間台灣政治經濟叢刊（2），台北：人間出版社（原日文版出版於 1975）。
- 鄭友揆，程麟蓀，張傳洪（1991）《舊中國的資源委員會 1932-1949—史實與評價》，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
- 錢昌照（1998）《錢昌照回憶錄》，北京市：中國文史出版社。
- 瞿宛文（2003）《全球化下的台灣經濟》，台灣社會研究叢刊-11，台北市，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
- 羅明哲（1992）日據以來土地所有權結構之變遷—兼論土地改革，陳秋坤/許雪姬（編），《中國歷史上的土地問題》，中研院台灣史田野研究室，255-283。
- 嚴演存（1989）《早年之台灣》，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
- Acemoglu, D., S. Johnson and J.A. Robinson (2001)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December, 91 (5) : 1369-1401.
- Amsden, A.H., (安士敦)(1979) Taiwan's economic history: A case of Etatisme and a challenge to dependency theory. *Modern China*, 5(3), July, 341-80.

-
- Amsden, A.H., (安士敦)(2001) *The Rise of "The Rest": Challenges to the West from Late-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ian, M.L. (2005) *The Making of the State Enterprise System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alman, D.(1992) *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London and NY: Routledge.
- Chang, Ha-joon (2005) How Important Were the Initial Condition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East Asia vs. Sub-Saharan Africa, in Ha-Joon Chang, *The East Asian Development Experience: The Miracle, the Crisis, and the Future*, London: Zed Press.
- Chang, Han-Yu, and Ramon H. Myers (1963) Japanese Colonialism Development Policy in Taiwan, 1895-1906: A Case of Bureaucrat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August, 433-449.
- Cheng, Tun-jen (1990) Political Regime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South Korea and Taiwan, in Gereffi, G. and D. Wyman (eds.), *Manufacturing Miracles: Path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East Asia*, Princeton: Princeton UP.
- Cullather, Nick (1996) Fuel for the Good Dragon: The US and Industrial Policy in Taiwan, 1950-1965. *Diplomatic History*. 20(1).
- Cumings, Bruce (1981)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P.
- Cumings, Bruce (1984)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ast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8(1): 1-40.
- Cumings, Bruce (1999) *Parallax Visions: Making Sense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Dore, Ronald (1990) Reflections on Culture and Social Change, in Gereffi,

- G. and D. Wyman (eds.), *Manufacturing Miracles: Path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East Asia*, Princeton: Princeton UP.
- Eckert, Carter (1991) *Offspring of Empire: the Koch'ang Kims and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Korean Capitalism, 1876-1945*.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Eckert, Carter (2000) Korea's Transition to Modernity: A Will to Greatness, in Merle Goldman and Andrew Gordon (eds.),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Contemporary East Asi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19-154.
- Economist* (2003/2/20.) Paradise Lost: A Survey of Brazil, *Economist*.
- Evans, Peter (1979) *Dependent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erschenkron, A. (1962)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 Gold, T.B. (1981) *Dependent Development in Taiwan*,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 Haggard, S, David Kang, and Chung-In Moon (1997) Japanese Colonialism and Korean Development: A Critique, *World Development*, 25(6): 867-881.
- Hausmann, R., and D. Rodrik (2003)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self-discover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72: 603-633.
- Ho, Samuel P.S. (何保山)(1978)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1860-1970*, Yale UP.
- Jacoby, N. (1966) *U.S. Aid to Taiwan*, NY: Praeger.
- Kirby, W.C. (柯偉林)(1990)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odern China: Economic Planning on the Mainland and on Taiwan, 1943-1958,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4, July, 121-141.

- Kirby, W.C. (柯偉林)(1992) The Chinese War Economy, in Hsiung, J.C., and S.I. Levine (eds.), *China's Bitter Victory: The War with Japan, 1937-1945*, 185-212. NY: M.E. Sharpe.
- Kirby, W.C. (柯偉林)(2000) Engineering China: Birth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1928-1937, in Wen-Hsin Yeh, (ed.), *Becoming Chinese: Passages to Modernity and Beyond*, 137-160. Berkeley: U. California Press.
- Kohli, A. (1994) Where Do High Growth Political Economies Come From? The Japanese Lineage of Korea's Developmental State, *World Development*, 22 (9): 1269-1293.
- Lin, Ching-yuan (1973) *Industrialization in Taiwan, 1946-72: Trade and Import-substitution Polici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NY: Praeger. (中譯本：林景源，〈台灣工業化之研究〉，台灣研究叢刊 117，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81)
- Park, Tae-Gyun (朴泰均)(2004) Different Roads, Common Destination: Economic Discourses in the 1950s in South Korea,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 Rodrik, Dani (2004) Getting Institutions Right, working paper,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http://ksghome.harvard.edu/~drodrik/ifo-institutions%20article%20_April%202004_.pdf
- Stiglitz, J.E. (2002)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Y: Norton.
- Wade, Robert (韋德) (1990)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P.
- World Bank (1993) *The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 a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report, published for the World Bank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